

如東文史稿選

第 二 期 （总第 2 期） · 内部资料 ·

政协如东县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编

1987年12月24日印

回忆先父曹月如

曹 旭

家父姓曹名恒增，字月如，别号光，原籍江苏海安人，1903年生。少年求学于海安公立高等小学校，因勤恳刻苦，品学兼优，深得老师钱少兰的赏识，故而鼓励他深造和立志教育事业。奈因祖父是如皋徐成丰京货店的老职员，家境贫寒，动员再三，仍无意让他继续上学。后不得已，在钱少兰老师的资助下，才得进入扬州国立第五师范学校读书。家父深知上学不易，学习格外用功。快毕业了，忽然生了一场伤寒病，只好辍学在家治病，一年后才勉强康复。1921年，经钱少兰的帮助和朋友们的推荐，先后去如皋贾家巷、林梓、白蒲一带任教。因为师范学校没有毕业，是没有文凭的教员，牌子不硬，待遇也低，一个月只有七、八元、十来元的新水。但他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很强，要当就要当一个称职的教师。他一而努力做好教学工作，一而勤奋学习教学所必须具有的各种知识和技能。时间长了，不仅能教好语文、算术等各门功课，还能吹、拉、弹、唱、写一手好字，画一手好画，尤其擅长画虫、鸟、花卉。又由于深受五四运动爱国进步思潮的影响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封建统治的腐败，国民党官府衙门的恶习陋弊，十分痛恨，经常借写日记抒发心中的愤慨，久之，他的日

记竟有几十本。在白蒲小学任教时，一个姓徐的校长，长期扣教员的新水，又怕教员们反对，就挖空心思整教员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姓徐的发现了家父的一本日记，便暗中向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告密。当时，正是镇压共产党的白色恐怖笼罩如皋一带的时候，如皋城门上挂着许多人头。幸好县党部里有位小职员认识我的父亲，暗中送了消息，才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。父亲连夜逃离白蒲，躲在海安附近，一年多不敢露面。俟风头过去了，于1930年，经友人季之朋的介绍，到远离家乡190多里的掘港大豫垦区中一区的农教小学任教。

农教小学是如皋县建设局棉业推广所附设学校，和县教育局没有隶属关系，可以不耽心姓徐的教棍再来寻衅滋事。父亲去那里工作了一年多时间，到1932年夏，为了生活方便，把我母亲和我们兄弟一家人接去一起居住，一住就是两年多，这是我们家生活最安定的时期。

每逢寒暑假期间，县建设局的棉作试验场或稻作试验场要办展览会，都把我父亲找去帮忙，而我父亲对于这种差事，总是不辞辛苦，任劳任怨，埋头苦干，尽力干好。对于家父的这种实干精神，可以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晓得他这个特点，所以，喜爱他的，跟他交朋友的人越来越多。

张友声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朋友之一，因为两人办事都很热心。一经相处，就比较相契。后来，张友声被委派到直镇任渔业指导所的指导员，同行的还有沙松涛等人。沙原是家父的学生，相互关系也比较融洽。1934年春天，家父应邀，为提高渔民文化，发展如皋沿海一带的渔业，推广科学捕捞技术，去何家灶筹办渔民学校。家父离开了熟悉的环境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遇到种种困难，经过一番筹划，临时跟同乡家商借了两间小屋，把我们一家四口人安置到掘港

镇上，家父就隻身来到何家灶。

当时的何家灶，除北坎、洋口外是渔民最集中的地方，距直镇也最近，只有七华里，这里的盐民也很多，以产煎盐著称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渔、盐民越来越需要提高文化。可是，那时的何家灶，包括上灶、下灶，东边到十八总，西边到金家灶，一百几十户人家，没有一所学校，识字的只有寥寥数人。家父到那里之后，首先联络各方有影响的人士，跟他们交朋友，帮助办些力所能及的事，谈心商量，真诚相处，使办学的事首先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。

何家灶还有一座寺庙，叫三元宫，供奉三元帝君。寺庙的房屋较多，要办学校，校舍只有从这里解决。这座寺庙没有和尚，做主的是些“庶首”，他们每年轮流管理庙里的事情，是些说话算数的人。所以做好“庶首”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。记得“庶首”有二十几位，除了有名望的人外，大多数是渔、盐民。家父逐个拜访，跟他们谈心交朋友，同时，也通过有名望的人给予影响作用，说明保证他们的信仰活动，也请他们帮助把学校办起来。经过几方面的努力，“庶首”们都赞成办学校，并商定把菩萨从厢房搬到大殿里，东西厢房和西耳房让出来做校舍，有时还表示动员自己和亲友的子女来上学。至此，校舍问题基本解决了。

接着就是房屋修缮、装饰布置的问题。渔业指导所拨给的开办费很少，事业只有精打细算。家父计划将东厢房做教室，西厢房做办公室和宿舍，西耳房校小做厨房。除了房屋门窗修缮，桌凳加工，请泥瓦木工外，其余的布置、粉刷、油漆、壁画、标语等等。一切都是亲自动手。经过几个月的忙碌，到1934年秋天，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，渔民子弟学校正式开学。从此，黄海之滨的渔盐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校，学校一切经费都由渔业指导所按月发给，但不敷支用。

这里还应该提到的，这所学校的创办和以后的发展，直镇镇长刘慎修、刘照春，育才乡乡长李惠人，直镇小学校长王冠千，何灶灶长徐先达，以及附近的育才小学，蔡庄小学的负责人都出了力帮了大忙的。

该校的学生都是盐、渔民的子女，多时达五、六十人，开始只有一、二年级，三、四年级是以后发展起来的。第二年又开办了成人夜校，有学生三、四十人，分甲、乙、丙三个班。学生的课本、练习簿、笔墨纸张，都由学校供给，许多学生的名字也是老师帮助代取。

教学方式采取复式教学。夜校又要适合青年人的特点，除了识字、时事知识课外，还开展了放唱片、乐器、棋类等文体活动。

全校就是一个教师，白天要上课，晚上教夜校，稍有空闲要备课，还要从事地方上的一些活动。灶长、保长有了事情，要找他商量协助，渔盐民中有了红白喜事，也找他帮忙。平时，要帮助书写契约信件。过年了，要走家串户写门对春联。又因家父办事公道、耐心、讲道理，人们有了买卖、债务、家庭纠纷，都要请他帮助调解，遇到危难的事也要找他商量想办法。这样他从早忙到深夜，差不多一年到头，没有一天空闲。但是，他的确成了何家灶渔盐民的知心朋友，他熟悉每个人，每个人也都了解他，对他无话不谈。走到那里，那里都会听到热情亲切地招呼“曹先生”的声音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了，南通、如皋、掘港相继沦陷。国民党县政府人员逃之夭夭，直镇渔业指导所的人也跑掉了。学校经费来源断绝。国民党部队的游兵散勇常来王家潭、何家灶一带骚扰抢劫，土匪、海匪横行，绑架勒索的情况，不断发生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民不聊生。学校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。一度改用私塾的名义掩护教学。家父眼看急转直下的局势，终日抱怨“国民党当局”无能。耽心如此发

展下去，终有一天会当亡国奴。

1938年，掘港的日伪军退到南通，苏东地区紧张的形势稍为有了缓和。我党地下工作者如史白、理明、程德耀、曹绍中、徐可琴等先后来海滨何家灶一带宣传抗日，开辟工作。他们对家父很器重，经常谈心，颇为投机，还介绍了许多进步书籍给他看，特别是读了《论持久战》、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等书之后，好比拨开迷雾重见光明，对我党的抗日主张、抗日的战略、策略等非常拥护，对抗日前途也增强了信心，从而积极支持组织盐民抗日协会，建立盐民抗日自卫队的活动，并主张利用学校作为宣传抗日的基地，继续办好渔民学校。地方上许多有影响的人士也主张恢复学校，认为老师仍由我父亲担任。经费问题，经过反复商量后决定：先暂由何金两灶灶长出面，继而在盐民抗日协会成立后，由协会出面，在各盐灶征收的伏火费（每副灶烧一天盐称一伏火；从每伏火的收入中，抽取一定的费用，缴给盐场公署，称伏火费）中，提取少许作为办学经费。尽管数量有限，学校还是在广大盐民的支持下恢复了。这个办法一直延续到我新四军东进到1941年直丰一带抗日政权建立，并由区政府按月供给公粮之后才停止。

谈到家父的为人，何家灶一带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，可能都有印象。他是诚恳的、正直的。他严于律己，宽厚待人，注重礼貌，和蔼亲切，敢说公道话，敢办公道事。对我们兄弟要求非常严格，经常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，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他非常注意交朋友，不仅重视交社会上有影响的朋友，也重视交劳动人民中的穷朋友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穷教师。朋友中有了困难，不论大小，只要他能做到的，都尽力站出来帮忙。所以，他到那里工作，那里都有一批知心朋友。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热爱祖国，关心时局变化，忧国忧民。

痛恨帝国主义，痛恨旧社会，深恶国民党里的腐败现象。几次有人动员他参加国民党，均被婉言拒绝。他以当一个无党派的人士为荣，认为这是他的清白之处。接触我党之后，由衷地拥护党的主张。跟我党同志相处颇为知己，介绍情况和商谈国事，均直言不讳。并鼓励和支持我们兄弟参加社会工作。他不贪钱财，不畏权势，安于清贫生活，非常讲究骨气。也曾有人邀请他去做官，什么“上尉”“少校”的，他一概不愿兴趣。可是对于他的教育事业，则日以继夜，呕心沥血。1937年冬，终于积劳成疾。其后，长期为肺病所折磨。但是，只要精神稍为好些，就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，仍然顽强地工作着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我从事教育事业20年。最后为渔民学校，只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”。

家父于1941年11月去世，时年仅38岁。由于家贫如洗，死后的棺木、空地等全靠当地朋友们的资助解决。这是我和我的全家永远不忘的。

〔编者注：曹旭同志原系如东县副县长，现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其父曹月如乃解放前何庄小学教师。他不计个人得失，热心为渔民办学，与我党地下工作者肝胆相照，积极支持抗日活动。深受当地人民爱戴。现将曹旭同志的《回忆先父曹月如》略加删节后刊用于上。〕

黄叔游先生传略

黄先生字观艺，名叔游，幼聪颖。1913年毕业于南通第一代用师范学堂（现南通师范之前身）。当年秋，任如皋县掘港达德小学校长。为求深造，复于1915年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堂，1919年为该校文科第一届毕业生。临毕业前曾获得公费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事业，为期约3月。

先生治学严谨，事业心强。他在日本考察时，看到日本学校注重体育，训练学生武士道精神，在史地课本中，对中国历史悠久、地理条件等优越进行详尽描述，观之之心昭然若揭。先生对此十分惊异和忧虑。感到强国必先强民，教育是立国之本，此乃先生终身执教，呕心沥血献身教育事业之思想基础。

毕业后即受聘为江苏省立第七中学（后更名为省立南通中学）国文教员。未几年，晋升为该校首席国文教员。

1938年3月，侵华日军占领南通城，学校被迫停办。先生乃愤归皋东。同年夏初，应乡里各界人士邀请，与教育界知名人士管劲丞先生共同筹建“如皋县立掘港中学”，并受命为校长。该校创建于战争时期，经费不足。为了聘请知名教师，添置图书仪器，办好学校，先生宁愿克己奉公，不付薪金。除主持学校全面工作，还亲兼一班国文课程。校内外要务，事必躬亲。

先生平日工作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尤其在关键时刻，能顾全大局，勇挑重担。正如管劲丞先生在掘港中学创建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大会上所说：“黄校长是一位在‘湿本梢’的校长”。其意即：担子很重，也很困难。虽说掘港中学是县立中学，但创办于战时动乱年代，经费未源短绌，虽因陋就简，亦常处于百般拮据状态；加上校内教务、

训育主任常跟校长闹别扭，并企图拉走教师拆学校如今；其时，韩德勤还派了一批人采校以“视察”为名，实为加强统治，因此先生要支撑这所新办中学颇为艰辛，实属不易。

先生生活一向简朴，蔬食布衣为乐。其宅居距校约4里，平日很少回家，食宿校中，偶尔回家采往步行。

其时，侵华日军循线于通如点线，地方杂牌武装不事抗日，专谋私利，肆意欺压人民，局势复杂多变，往往一夕数惊，难以应对。驻掘国民党军队张华炳部作恶多端：公开敲诈勒索，秘密贩运毒品。掘港中学进步学生王承志、李清德等发现张部有人贩来一批毒品（白面），便去抄来，准备销毁，不料被国民党地方政府人员拿去，说什么“禁烟的事自有我们来管，你们是学生，你们读你们的书去”。当时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些人员也讲禁毒，但那仅是装装场面而已。实际他们是一丘之貉，朋比为奸。这几位学生凭着一股爱国热情真的抓起毒品来了，这就得罪了张华炳的部队。张部的士兵扬言要找这几个学生算帐。黄校长面对军界人士的挑衅，只好以退为进，公开“处分”了这几个学生，不准他们离校外出，实际上把学生保护起来。

1939年，驻掘国民党军队徐承德部士兵常跟掘港中学发生冲突。先生恐事态扩大，想出一个“以毒攻毒”的方法：请徐承德来校对学生讲话，籍以镇慑其部下。徐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抬举，欣然来校，讲话内容杂乱无章，结束时还粗鲁地叫嚷：“买你们两百块大洋头肉吃”，黄校长认为有辱斯文，坚不接收，局面有些尴尬。徐的秘书见风便舵打圆场，说：“校长先生，给你们买些图书吧”。徐说：“什么涂书？就是头书好了”。先生这才啼笑皆非地将钱收下了。从此，徐部士兵也不来找学生的麻烦了。

1940年秋，新四军东进，抗日民主政府苏中四专署及四分区

司令部领导机关常驻掘港。学校常请地专领导干部李方、洪泽、陈同生等来校做报告。分区文工团也派人来校教唱革命歌曲。而校内进步学生在新四军东进前即在校内外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，组织进步的读书会以传播马列主义思想。先生都以积极的态度对学生献计、保护支持他们的进步行动。

1941年初秋，掘港镇沦陷，学校被迫停办，先生因年迈体弱隐居乡间。伪区公所多次邀请先生主持设在敌伪据点里的掘港中学，均被拒绝。先生在家每日锄草、纺纱，自食其力。有一次，一小队日军下乡“扫荡”，闯入黄宅，发现书厨内有日文教科书，以为黄先生懂日文，于是对黄先生比较“尊敬”，约束部下不许乱跑。因此黄先生家虽未受日军蹂躏，也比较安全。由于他倾心于我党我军，积极支持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，故我地方军政干部常在他家隐蔽。分区李方司令北撤时，将摩托车托他保管数年，直至抗战胜利前夕取去。先生曾多次为通过敌“封锁线”的我方军政人员提供方便。掘马南区长白桐本文教助理张炯等常到他家落脚进行革命活动。1943年春节，叶邦泉等同志就在他家度过的。根据地初建时期，先生作为知名人士、仕绅代表先后出席县、分区和苏中的参政会议。

先生为人诚挚正直，从不计较个人名利。抗战胜利后，如东县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如东中学校长，同时，南京中央大学电邀他前往任教。他未去南京，毅然就任如东中学校长之职。后来，由于“左”倾思想影响，先生几度受委屈，但他坦然处之，继续从事教育事业，为培养后代献出余年。

1947年初去镇江中学任教。1962年退休。“文革”中，这位八旬老人亦未幸免，同样受其冲击。先生1892年2月26日生于掘港南郊余湾乡。1978年2月14日病逝于镇江，享年87

岁，其子女五人有投笔从戎后转业地方工作，有从事交通水利建设事业，有终生执教继承父业，皆无愧于先人遗愿。

先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重视以身作则，为人师表。他的高尚言行在师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他为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，赢得了学生和社会的尊敬。“桃李满天下”之誉对他来说，确是当之无愧。

(刘克勤整理)



(文献资料摘录)

△ “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。”“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，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。” ——周恩来

△ “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，用历史知识教育后代。” ——周恩来

△ “文史资料工作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” ——邓颖超

△ “人民政协通过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，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及海外爱国人士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，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，有着很大的作用。” ——邓颖超

△ “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作为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。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所决定的，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。” ——杨成武

△ “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应当在政协总的工作任务中，作出自己的贡献。” ——杨成武

马塘旅外同乡公墓

吴观北 方治鉴

马塘西三里墩公路北侧，昔日有一座六角亭，亭前竖立墓表——石牌坊，横额上镌刻着魏体镗金大字“归正首丘”，颇为壮观。四个石柱上刻有两副对联：“万骨同归公墓，千秋永作义山”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。亭后是二、三十亩的坟地，这便是马塘的“旅外公墓”，亦称“义冢”。

二十世纪初叶，马塘地区外出谋生或经商的较多，不少人在上海落脚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侵华日机在上海狂轰滥炸，平民死伤甚多，马塘人中未能幸免的也不在少数。生时背乡离井，死时遗骸他乡，乃是人间憾事。多少同乡人为罹难者痛心疾首，自然想到这些人生前怀乡，身后更当落叶归根。于是，以马塘旅沪同乡会为核心，由张弼千等发起，并得到地方绅董李俊卿等的支持和慷慨捐助，首先购棺收殓，暂厝沪地，后于1937年在马塘镇西郊购田建为墓地，座北朝南，面临串场河（即今如泰运河），复雇船将那些棺柩运回家乡安葬，以慰罹难者的英灵，安抚其家属。据说公墓中埋有九十多口棺柩。

墓表上写的是“归正首丘”，出自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“古人有

言曰：“狐死，正首丘，仁也”。孔颖达疏：“所以正首而向丘者，丘是狐属穴，根本之处，虽狼狈而死，竟犹向此丘，是有仁慈之心也。”基督教上书“归正首丘”，引伸为人死后归葬故土，了却这些游子思乡之情，怀亲宿愿。1942年，日军侵占如掘一线后，战火摧毁石坊，几经沧桑，墓地夷平。可是，当年旅沪同乡和乡里仁人那种体恤无辜死难者、不忘同胞骨肉情的义举和精神，往往犹为乡里称赞。